

方法·視野·文化脈絡：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論再生緣》

張思靜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引言：《論再生緣》引發的學界爭鳴

《論再生緣》為陳寅恪(1890–1969)晚年重要著作，主要考釋清代長篇彈詞小說《再生緣》的作者生平及寫作始末，兼論其文學美學成就。是書1953年9月起稿，1954年2月完成。完稿之後，作者自費油印三百本分贈親友，後經由章士釗攜入香港並流播海外。《論再生緣》於1959年由香港友聯公司出版單行本，陳寅恪晚年將其編入《寒柳堂集》，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發行，是為《論再生緣》在大陸地區首度公開發表。《論再生緣》自刊行之後便不斷引發學界熱議，其中最重要的回應來自余英時和郭沫若(1892–1978)。

余英時1958年留學美國時，偶見《論再生緣》油印本，讀後撰〈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一文，借《論再生緣》考釋陳寅恪晚年心境，認為陳氏撰此書的用意在於感慨世變，自傷身世。¹上世紀八十年代，陳寅恪晚年詩文整理出版，余英時重拾話題，在《明報月刊》先後發表〈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後與〈書後〉一起集結成冊，於1984年由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引起強烈反響，海內外皆有學者就余說進行辯議。²

因為陳寅恪晚年居於廣州，且《論再生緣》完稿後並未投遞國內出版機構，大陸主流學界關注此書反較海外為遲。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於1960年始見《論

¹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頁228。

² 詳見馮衣北：《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與余英時先生商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汪榮祖：〈「剩有文章供笑罵」——敬答余英時先生〉，載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53–60。

再生緣》，³讀後產生興趣。自1961年5月至翌年1月間，郭氏在《光明日報》連續發表七篇長文回應陳說。

對於郭沫若的熱烈反應，當代學界一般認為其背後有政治因素的作用。余英時即指出，郭沫若這一舉措「並非出於學術興趣，而是『負有使命』」，其目的主要有二：一方面想借討論《論再生緣》為出版《再生緣》做熱身；另一方面又在回應中使用「挑剔辯駁的口吻」以減低《論再生緣》的學術分量。

筆者以為，減低《論再生緣》的學術分量似乎不是郭沫若最初的寫作動機。在其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再生緣》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陳端生〉中，郭沫若立足於引介和推舉《再生緣》原著，對陳寅恪的論述亦基本持認同態度。而在其後的幾篇文章中，「辯駁」的用意才顯得較為明顯，「辯駁」的對象則完全集中在文獻考證方面。郭沫若在陳寅恪既有論述上補充了有關《再生緣》作者陳端生(1751–約1796)的新見材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認為陳端生為陳雲貞之別名，而陳雲貞見收於清代閩秀詩集《妝樓摘豔》中的兩首〈寄外詩〉即可用於考證陳端生的身世情況。這一說法提出之後引起諸多疑議，陳寅恪本人亦於1964年撰寫〈論再生緣校補記〉回應此說，認為陳雲貞並非陳端生。⁴

事實上，這一看似純學術立場的文獻討論背後帶有意氣之爭。郭沫若於1958年6月10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關於厚今薄古問題——答北京大學歷史系師生的一封信〉，號召「就如我們今天在鋼鐵生產等方面十五年內要超過英國一樣，在史學研究方面，我們在不太長的時期內，就在資料佔有上也要超過陳寅恪」。⁵此說可以看作當時主持科研工作的郭沫若在面對意識形態相異，而學術影響深遠的所謂「資產階級的史學家」時內心的焦慮。這一心理背景或可為郭沫若發現陳雲貞〈寄外詩〉時的意外驚喜之情，以及獨排眾議，極力維護〈寄外詩〉文獻價值的動機提供參考。⁶

正因為爭議背後的用意並非僅僅關乎學術，郭沫若發起的文獻之辯似乎對陳寅恪造成相當的心理壓力。據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一九五四年」條記載：「二

³ 郭沫若〈序《再生緣》前十七卷校訂本〉云：「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初旬，金燦然同志把〈論再生緣〉一文給我看了。」見《郭沫若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929。

⁴ 陳寅恪云：「若夫雲貞寄外書及詩，頗與再生緣類似，論者遂取此為『合二而一』之證。殊不知同一時代之作品，受環境影響，其格調本易相近。且再生緣一書，當日已甚流行，好事之人故作狡獪，偽造新骨董，自極可能。」見陳寅恪：《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78–79。

⁵ 郭沫若：《文史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頁15。

⁶ 郭沫若說：「我急于把有關的資料翻看了，不能不肯定：這是一個出乎意外的發現，簡直有點類似海底撈月了。」「為了便于作進一步的研究，我現在把陳雲貞和陳蓮姐的詩都抄在下邊。這些詩在目前也都是不容易接觸到的資料了」。見《郭沫若古典文學論文集》，頁892、894。

月，《論再生緣》初稿完成。自出資油印若干冊。後郭院長沫若撰文辨難，又作〈校補記〉。⁷而陳寅恪題於〈校補記〉之後的序言，自稱「《論再生緣》一文乃頹齡戲筆，疏誤可笑。然傳播中外，議論紛紜」，結尾則嘆，「知我罪我，請俟來世」，⁸寥寥數語，備極寂寥。與之相應，當代學界對郭沫若這組回應文章的態度亦不再聚焦於考辨文獻問題，而是關注論述背後的政治策略。

誠如陳寅恪所言，《論再生緣》寫成之後當即「傳播中外，議論紛紜」，而時隔數十年後，當年「議論紛紜」的現象本身又構成學界話題，被視為考察五、六十年代知識分子生存境遇和精神狀態的重要材料。只是，雖然《論再生緣》的本質是文學批評領域的學術專著，自其問世以來的半個多世紀，圍繞是書產生的種種論說卻鮮少與文學評論有關，而這一點，正是筆者此篇論文所要重點關注的。後文將在彈詞研究和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發展脈絡中來考量《論再生緣》的學術價值及啟示意義。

同調異趣：陳寅恪與二十世紀彈詞接受史

前文已經指出，郭沫若撰寫系列文章回應陳寅恪的《論再生緣》，背後的主要動機為「在資料佔有上超過陳寅恪」，所以郭氏著力於辯證陳雲貞相關材料的可靠性，對於《再生緣》文學成就的論述則只是略有涉及。然而，有別於文獻方面的刻意挑戰，郭沫若對《再生緣》文學層面的判斷則幾乎與陳寅恪同出一轍，即二人都極力推崇《再生緣》的文學價值，認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傑作。

郭沫若就文獻考釋對陳寅恪發起的「挑別辯駁」一直廣受學界關注，⁹不論是文章發表當時開啟的材料真偽之辯，還是近二十年來學界對這一辯駁背後政治背景的發微，而文學層面的論述則因其與陳寅恪呈現高度的一致性而鮮少再被發揮。然而，事實上陳、郭這一相似論調背後顯露的恰是迥異的文學趣味和思想脈絡。這一似是而非的背離因其並非出於郭氏刻意的、策略性的反叛而尤其值得玩味，亦正可為我們窺探不同學術背景及文化立場的學者如何解讀同一文本提供線索。

陳寅恪指出：「《再生緣》實彈詞體中空前之作，而陳端生亦當日無數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郭沫若自稱本着「想來檢驗一下陳教授的評價究竟是否正確」的心態閱讀《再生緣》原著，而檢驗的結果則是承認「這的確是一部值得重視的文學遺產」，¹⁰「陳端生的確是一位天才作家」。¹¹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的這一論斷雖與陳寅恪完全相同，但其所以如此論斷的依據則與陳說呈現頗為微妙而有趣的差異。

⁷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148。

⁸ 陳寅恪：《寒柳堂集》，頁96。

⁹ 參見余英時：〈陳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東方早報》，2011年1月16日，第B03版。

¹⁰ 郭沫若：《郭沫若古典文學論文集》，頁929-30。

¹¹ 同上注，頁876。

陳寅恪和郭沫若都首先從讀者的立場出發，提及自己曾被《再生緣》深深吸引這一感性的閱讀體驗。郭沫若表示，《再生緣》一書他在半年之內讀了三遍，讀得津津有味，以至於「竟使我這年進〔近〕古稀的人感受到在十幾歲時閱讀《水滸傳》和《紅樓夢》那樣的着迷」。¹²既然與少年時期閱讀章回小說的感受相提並論，很明顯，《再生緣》吸引郭沫若的是其故事情節之曲折動人。而陳寅恪則在《論再生緣》的開篇即稱：「衰年病目，廢書不觀，唯聽讀小說消日，偶至《再生緣》一書，深有感於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證其本末，草成此文。」¹³從這一自白中可以看出，陳寅恪之所以會注意到《再生緣》，乃是因為對透露了「作者之身世」的自述文部份深有感觸。可以說，是被作者自述部份的紀實文字所感動，還是被作品正文部份的虛構情節所吸引，這是陳寅恪和郭沫若閱讀《再生緣》之後的第一項分歧。

陳寅恪為甚麼會被《再生緣》的自述部份吸引，所謂「深有感於其作者之身世」的「感」自何來，後文還將做進一步探討。在這裏，筆者首先要提出的一點是，單就重視自述文這一方法而言，陳寅恪即有別於早期或與其同時的彈詞研究者，並對當前的研究進展具有啟示意義。

清代彈詞女作家有在作品的回前回末穿插自述文字的傳統，¹⁴或藉此交代創作緣起，或描摹眼前的景緻、風物、節氣，再或抒發個人的心懷情緒，而陳端生亦不例外。《再生緣》前十六卷寫於端生尚未出閣的少女時期，每卷卷首卷末皆有作者自述，然篇幅短小，僅以三言兩語歌詠眼底風景或閨中間情。第十七卷作於端生中年之後，與前十六卷的寫作時期相隔十二年之久。十七卷卷首的自述文也與往日風格截然不同，一變而為一段將近千字的個人獨白。在這段文字中，陳端生對自己過往的人生經歷做了整體性的回顧，從緬懷未字之時的「姊妹聯牀聽夜雨」，到追憶新婚之後的「挑燈伴讀茶聲沸」，直至眼下與丈夫被迫分離，以至於「日坐愁城凝血淚」的淒涼處境。正是這段文字使陳寅恪深受感動，不但在《論再生緣》開篇之處即全文摘引，還在之後的論述中不斷提及。

陳寅恪之所以特別留意《再生緣》第十七卷卷首的自述文，自然和這段文字能為考釋陳端生生平提供線索有關。然而陳寅恪也明確指出，全文摘錄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供考證之便利」，而是「兼可見其詞語之優美，富於情感」。就文學批評層面而言，陳寅恪看重彈詞自述文的作法至少有兩個重要意義：首先，他是第一位正視自述文獨立審美價值的學者；同時，對自述文的觀照是他理解和欣賞作品正文部份的基礎所在。

¹² 同上注，頁930。

¹³ 陳寅恪：《寒柳堂集》，頁1。

¹⁴ 這一傳統或與彈詞小說是從書場彈詞演出而來有關，而其形式也類同詩歌創作中的「起興」手法，即欲言本事，先托詠他物作為一種情緒上的漸入。

與之相對，不論是與陳寅恪基本同期進行研究的郭沫若，還是更早先的學者比如鄭振鐸（1898–1958）、譚正璧（1901–1991）等，對彈詞自述文的興趣都僅限於文獻層面。換言之，這些學者從自述文中看到的是與作者有關的背景信息，而非自述文本本身的文辭、意境之美。同時，有或沒有自述文的存在並不影響他們對作品的賞析和定位。例如，譚正璧曾摘引《再生緣》的自述部份以探討陳端生的寫作動機，但論及《再生緣》「文辭優美」、「描寫細膩」的特點時，所引以為證據的則全係作品的正文部份，並未如陳寅恪那樣為自述部份「哀怨纏綿」、「殊足表現女性陰柔之美」的藝術價值所傾倒。¹⁵同樣地，鄭振鐸列舉《再生緣》第一卷中「閨幃無事小窗前」、「聊將彩筆寫良緣」等句子，以此推斷彈詞女作家「都是為了要消遣閒暇，方纔着筆寫作的」。¹⁶對於第十七卷卷首自述的感受則是：「寫到十七卷的時候，她的生活上一定遇到很大的刺激，作者的情緒突然的淒楚起來。」¹⁷比較而言，陳寅恪不僅在考據層面深究這一「很大的刺激」究係何指，更重要的是在文學批評的層面探討了書寫這一「很大的刺激」本身所具有的審美價值，以及其如何影響了作品正文部份的風格呈現。就獨立的美學價值而言，陳寅恪特別欣賞這段文字的「哀怨纏綿」、「淒涼慷慨」；而就其對正文的影響來說，陳寅恪指出，他最初對《再生緣》的印象乃是「思想陳腐」，認為其所寫無非是「女扮男裝、中狀元、作宰相等俗濫可厭之情事」。直到重新閱讀《再生緣》文本並為自述文所感之後，才對正文部份有了全新的理解：「恍然知《再生緣》實彈詞體中空前之作，而陳端生亦當日無數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¹⁸可以說，於陳寅恪而言，只有將自述文中呈現的陳端生自我形象納入對作品的整體觀照中去，後文的虛構故事才有了別樣深遠的意味。

陳寅恪從自述文入手研究彈詞的思路在早期的學者中雖屬特例，但近二十年來，彈詞學界普遍重視自述文，對自述部份的文本細讀日趨精微，單獨評議自述文字的思想意涵、美學呈現，或將自述部份與正文部份比較閱讀的方法也都廣受青睞。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雖則同樣重視自述文，當代學者這一研究視野的出發點則與陳寅恪不同，而是和他們受到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的影響有關。自我書寫，尤其是女性的自我書寫為二十世紀西方文論中的重要議題，而傳記理論和女性主義理論的進展啟發了彈詞研究者重新考量自述文的價值。在胡曉真的研究中即曾運用 James Olney (1670–1744) 的學說闡發彈詞自述文的隱意；¹⁹鮑震培亦以伍爾夫 (Virginia

¹⁵ 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頁393–96。

¹⁶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頁373。

¹⁷ 同上注，頁374。

¹⁸ 陳寅恪：《寒柳堂集》，頁56–57。

¹⁹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67。

Woolf, 1882–1941) 的女性主義論述對照彈詞女作家的自傳。²⁰ 陳寅恪在《論再生緣》中分析陳端生的自述，其理論背景卻並非來自西方女性主義或傳記研究。倘若溯源陳寅恪關注自述文這一研究視野背後的學術譜系，毋寧說本自中國傳統文論中的「知人論世」、「發憤著書」。²¹ 例如，《再生緣》中女主人公孟麗君性格叛逆已為學界和一般讀者所知，陳寅恪亦特別關注這一「不平之鳴」的主題，但同時他還敏銳地指出，這種心理情緒的形成和陳端生的成長背景大有關聯：

端生在幼年之時，本已敏慧，工於吟詠，自不能不特受家庭社會之薰習及反應。其父玉敦、伯父玉萬輩之才學似非卓越。至於其弟安生、春生、桂生等，當時年尚幼稚，亦未有所表見，故當日端生心目中，頗疑彼等之才性不如己身及其妹長生。然則陳氏一門之內，句山以下，女之不劣於男，情事昭然，端生處此兩兩相形之環境中，其不平之感，有非他人所能共喻者。職此之故，端生有意無意之中造成一驕傲自尊之觀念。此觀念為他人所不能堪，在端生亦未嘗不自覺，然固不屑顧及者也。²²

從中可以看出，陳寅恪固然借助《再生緣》中自述文字來考證陳端生生平，而所考得的端生生平資料亦反過來成為陳寅恪觀照文本的有利工具。

前文已經指出，郭沫若和陳寅恪閱讀《再生緣》之後的第一反應即有所不同：郭沫若着迷於正文故事，而陳寅恪有感於身世自述。與這種偏向相對應的是，郭沫若將陳端生歸置於敘事文學的脈絡中進行定位，認為其可與世界一流的小說家比肩：「從敘事的生動嚴密、波浪層出，從人物的性格塑造、心理描寫上來說，我覺得陳端生的本領比之十八、九世紀英法的大作家們，如英國的司考特 (Scott, 公元一七七一年—一八三二年)、法國的斯湯達 (Stendhal, 公元一七八三年—一八四二年) 和巴爾塞克 (Balzac, 公元一七九九年—一八五〇年)，實際上也未遑多讓。」²³

與郭沫若相似，在感性的閱讀體驗之外，陳寅恪同樣試圖訴諸文學史的發展脈絡來品評《再生緣》的藝術價值，但二人所選取考量《再生緣》文學價值的參照系則不盡相同。雖然在論及《再生緣》「結構」部份的時候，陳寅恪將其與西方小說家如哈代等，及中國小說如《兒女英雄傳》、《紅樓夢》等相比較，²⁴ 但就整體而言，陳氏的文學參照系並不局限於小說文類。終《再生緣》全書，作者屢次提到中國文學史上的詩

²⁰ 鮑震培：《清代女作家彈詞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00。

²¹ 有關中國文論中「發憤著書說」的梳理可參見鄧玲：〈論發憤著書說〉，《文史知識》1999年第2期，頁22–23。

²² 陳寅恪：《寒柳堂集》，頁57–58。

²³ 《郭沫若古典文學論文集》，頁933。

²⁴ 陳寅恪：《寒柳堂集》，頁60。

詞、古文、戲曲、歌賦等作品，而在將《再生緣》與《紅樓夢》比較閱讀的時候，陳寅恪也並不執著於二者的情節佈置。相反，陳寅恪特別留意到一處細節：《再生緣》的自述文中有「杏花紅墜春已消」、「流水光陰暮復朝」之句，陳寅恪指出，這一意象發展自湯顯祖(1550-1616)《牡丹亭》中「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句，而又與《紅樓夢》中林黛玉之傷感不期冥會，只不過「悼紅軒僅間接想像之文，而端生則直接親歷之語」，所以後者「尤可玩味」。²⁵

筆者之所以特別提及陳寅恪如何梳理《再生緣》中一處細微表達背後的文學史傳承，仍然是因為這一做法相對於其他彈詞研究者而言有其特殊之處。《再生緣》作為清代女性彈詞小說的代表作，一向皆以其情節之複雜、人物性格之豐滿、描寫刻畫之生動而受到學界推崇。不獨郭沫若盛讚其「敘事的生動嚴密」、「人物的性格塑造、心理描寫」皆可媲美世界一流小說家，譚正璧同樣對陳端生描摹刻畫人情物理的手段讚不絕口：

描寫細膩本是彈詞的特長，《再生緣》的長處，在於別人視作平常之處，她偏偏敘寫得十分有致，而引人神往。主人翁孟麗君改名酈明堂，赴京考中魁首，在相府招親。梁相繼女素華，本是麗君女伴蘇映雪的化身，當二人見面時，在別人筆下寫時，一定是二人又驚又喜，各訴經過，沒有甚麼可以多寫。可是《再生緣》的作者卻把他寫成三千餘字，而且二人在未曾認清以前，卻又加倍的寫得波折。且看：〔以下為大段《再生緣》原文摘錄〕²⁶

《再生緣》敘事技巧之傑出經由前此研究者再三強調已為人熟悉，而陳寅恪對作品中詠物抒情部份的格外注意提示我們進一步思考：除去講述了一個精彩的故事，塑造了幾個個性鮮明的人物之外，《再生緣》是否還另有其審美價值？陳端生能創作出《再生緣》這部作品，除了自身才情之外，是否與其受到前代作品的影響有關？這些問題，後文還將借「陳寅恪眼中的《再生緣》」這一話題詳細探討。在此，筆者想指出的另外一點則是，就《再生緣》與中國傳統文學的關係而言，郭沫若的看法同樣與陳寅恪存在差異。

在《〈再生緣〉前十七卷及其作者陳端生》一文的最後，郭沫若特別摘錄陳寅恪對《再生緣》的評價：「彈詞之作品頗多，鄙意《再生緣》之文最佳。微之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屬對律切』，實足當之無愧。而文詞累數十百萬言，則較『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者，更不可同日而語矣。」²⁷郭沫若對陳寅恪的這一論調大為讚賞，

²⁵ 同上注，頁75-77。

²⁶ 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話》，頁393。

²⁷ 此段陳寅恪原文見《寒柳堂集》，頁64；郭沫若的轉引見《郭沫若古典文學論文集》，頁880。

認為陳敢於「使端生遠遠超過了杜甫」，因而對「厚雅薄俗」的文學風氣有很好的矯正作用。²⁸然而，就這一點而言，郭沫若對陳寅恪的原文似乎有所誤讀。實則陳寅恪並沒有表示陳端生的文學成就已經超過了杜甫（712–770）。所謂「更不能同日而語」，指的是彈詞作品篇幅浩瀚，因此端生之創作更為困難，而非質量更佳。事實上，《論再生緣》原文在援引這段元稹（779–831）對杜詩的評價之後明確表示，「微之惜抱之論精矣，茲不必再加引申，以論杜詩」。由此可知，陳寅恪是在肯定元稹對杜詩品評恰當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此說亦可用來評價《再生緣》。郭沫若在其論述中則首先否定了元稹這一說法，認為杜詩並沒有微之所說的那麼高的價值。並且，在郭沫若看來，陳寅恪同樣以為杜詩不足當元稹之論，只有《再生緣》方才夠得上這麼高的評價，而這一觀點卻非陳寅恪的本意。

郭沫若承認，在初見《論再生緣》時，他對陳寅恪這樣的文化精英居然能欣賞彈詞小說感到相當詫異：「陳寅恪的高度的評價使我感受到高度的驚訝。我沒有想出：那樣淵博的、在我們看來是雅人深致的老詩人卻那樣欣賞彈詞，更那樣欣賞《再生緣》，而我們這些素來宣揚人民文學的人，卻把《再生緣》這樣一部書，完全忽視了。」²⁹然而，實際上，郭沫若未曾深究的一點則是，陳寅恪傾心於《再生緣》，並不是因為這部小說宣揚了人民文學。恰恰相反，陳氏能夠欣賞《再生緣》的基礎，正在於他能從中讀出「雅人深致」的成分。這一點，從陳寅恪在論述《再生緣》的閱讀感受時經常稱引詩詞、古文中可以看出。對於郭沫若而言，「彈詞」和「雅文學」是兩個相對的概念。甚至於，他認為《再生緣》的重要價值之一即在於陳端生「敢於寫作為上層人士所鄙視的民間文學——彈詞」，³⁰可是在陳寅恪的意識中卻並未完全將《再生緣》歸入俗文學，這從他認為元稹對杜詩的評語同樣可用來評論《再生緣》中可見一斑。陳寅恪的這一看法置放於二十世紀彈詞研究的脈絡中則尤可見其特殊意義。

彈詞小說在清代被視為小道，當時的知識階層普遍認為此種文體毫無價值可言。即使提倡女才者如陳端生的祖父陳兆倫（1700–1771），也曾明確表示，「女教莫詩為近」，而「惑溺於盲子彈詞，乞兒說謊，為之啼笑者，譬如一龍一豬，豈可以同日語哉？」³¹二十世紀以來，學界一直在試圖為彈詞正名，亦即確立其值得閱讀、值得研究的價值所在。早期研究著述中最負盛名、流傳最廣者有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1938年商務印書館初版）第二十章「彈詞」和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1934年光明書局初版）第七章「通俗小說與彈詞」。鄭振鐸、譚正璧的著述不僅在整理文獻、

²⁸ 《郭沫若古典文學論文集》，頁880。

²⁹ 同上注，頁929。

³⁰ 同上注，頁933。

³¹ 陳寅恪：《寒柳堂集》，頁61–62。

考鏡源流方面有重要價值，而且確立了此後彈詞研究的兩大基本格局：或將其置於俗文學的語境中進行考察，或將其放在女性文學的脈絡中進行觀照。其後，彈詞研究經歷了數十年的發展，理論或方法時有更新，但通俗性和「處處為女性張目」³²始終是學界公認彈詞小說的兩大最重要價值。

頗為有趣的是，在晚清之前曾因隸屬通俗文類，且作者、讀者多為女性這兩點而深受知識階級鄙棄的彈詞小說，在現代學界則恰恰因為同樣的原因而備受重視。就彈詞文類是否有其存在價值這一點而言，現代學界與清代當時的判斷雖截然相反，但其所持的依據則如出一轍，即兩者都先驗性地判定彈詞為「通俗的」、「女性的」文學。同時，雅/俗、男/女在任一時期的文學批評語境中似乎都是兩相對立的元素。例如，晚清學者夏曾佑（字穗卿，號別士，1863–1924）就曾認為：「綜而觀之，中國人之思想嗜好，本為二派：一則學士大夫，一則婦女與粗人。故中國之小說，亦分二派：一以應學士大夫之用，一以應婦女與粗人之用。」³³照此二分之法，彈詞小說無疑歸屬於「應婦女與粗人之用」的文學。事實上，彈詞的形式本自民間說唱，而清代彈詞小說的作者多為女性，這兩點固無疑義，但陳寅恪以一「雅人深致」的學者而深為彈詞作品所感，這一點似乎提示我們注意，「學士大夫」的思想嗜好，與「婦女粗人」的思想嗜好，並非如此涇渭分明，而是有著微妙而有趣的流動和滲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因為彈詞屬於「婦女粗人」的文學而不屑一論，或大加標榜其「人民文學」、「女性文學」的屬性，同樣妨礙了對這一文類更多複雜、幽微的審美特質的探索，以及對不同彈詞作家個性化差異的區分。陳寅恪《論再生緣》的一個重要意義即在於，它促使我們追問如下問題：除了講述了一個女扮男裝中狀元的有趣故事之外，《再生緣》還有甚麼文學價值及思想意義？

當代的彈詞研究學者胡曉真曾經指出，「中國的敘事文學研究必須嚴肅看待彈詞」。³⁴同樣地，彈詞研究必須嚴肅看待陳寅恪的《論再生緣》。無論是陳寅恪對《再生緣》的看法本身，還是其所以得出這一看法的批評方法及文學視野，都極具特殊性，有助於打破對彈詞文類源遠流長的習見及已為主流學界確立的研究格局。同時，郭沫若對《論再生緣》的諸多回應文章則成為理解這部專著的重要輔助工具。因為郭沫若與陳寅恪隱含在褒揚《再生緣》這一同調下的異趣：對自述文/正文、敘事技巧/抒情品格、雅/俗等問題看法的差異使陳寅恪研究的特殊性得以彰顯，而陳、郭之間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陳寅恪與整個二十世紀彈詞研究史的分歧所在。

³²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頁371。

³³ 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61。

³⁴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頁8。

時間感與生命體驗：陳寅恪眼中的《再生緣》

前文指出，陳寅恪的《論再生緣》促使我們追問《再生緣》於敘事技巧之外的文學價值和思想意義。對於這一點，其闡釋因人而異。在此，筆者首先想通過細讀《論再生緣》文本來回答一個稍小的問題，即陳寅恪如何看待《再生緣》。

前文已論及，陳寅恪欣賞《再生緣》的角度有一點非常值得重視，即他首先是被《再生緣》第十七卷卷首的自述文，而非作品的正文部份所吸引。這一有別於其他學者的研究思路，實則與陳寅恪個人的人生經歷有關。

余英時在〈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中指出，陳寅恪撰寫《論再生緣》的目的有二，「其一為藉考證《再生緣》作者陳端生之身世以寓自傷之意」；「其二則為藉《再生緣》之書而感慨世變，以抒發其對當前之極權統治之深惡痛絕之情」。³⁵

對此，筆者同意《論再生緣》確實寄寓了陳寅恪的個人身世之感，也在一定程度上顯露了他在當時時局下的心態和情緒。只是，筆者不認為這是陳寅恪撰寫此書的直接動機。與其說是為了要抒發自身情感而借《再生緣》以作文章，毋寧說陳寅恪從《再生緣》中讀出了於其心有戚戚焉的人生體驗，遂不能不對此書發一感慨。就余英時的〈書後〉一文而言，筆者認為較為可惜的一點是，作者對陳寅恪的心境固然極具探索之興趣，但對於《再生緣》文本本身則缺乏足夠的「理解之同情」。也許所有想要通過《論再生緣》研究陳寅恪晚年心境的學者首先不能避免的一個問題是：陳寅恪為何選擇《再生緣》而非其他詩文小說來寄託幽懷？他對陳端生這位三百年前的閩秀作家的認同感其來何自？《再生緣》又具有何種文本特質，使得陳寅恪可以藉此抒發對自身所處當下的感想？對《再生緣》文本本身缺乏如對陳寅恪般的了解和興趣，使得余英時的〈書後〉讀來略有隔膜之感。

相反，在余英時所撰寫的諸篇談論陳寅恪晚年心境的文章中，筆者認為最精彩而恰切的當屬〈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究其原因，正因為自身亦為史學家的余英時對陳寅恪所關注的史學問題造詣精深，故能備極「了解之同情」。筆者尤為認同余英時對陳寅恪所以能有如此學術成就的解釋：「陳先生的博聞卓識固然頗淵源於家庭傳統、社會背景、時代學風、以及特殊的教育過程，但這些因素都祇是外緣性的。最起決定性的作用自然還是他個人得天獨厚的秉賦：其中除了章學誠所分析的記性、作性、悟性之外（見《文史通義》外篇〈答沈楓堦論學〉），還得加上西方文學批評家所特別重視的『感性』（Sensibilities）。」³⁶事實上，不僅在史學研究層面，就文學評論方面而言，同樣是這種特殊的「感性」作用，使得陳寅恪能見人所未見，道人所未道。以本篇論文所關注的《論再生緣》為例，在面對一部以結構精巧、刻畫

³⁵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228。

³⁶ 同上注，頁6。

入微而聞名的彈詞小說之時，陳寅恪獨能從「深有感於其作者之身世」的角度予以闡發，便是基於這種敏銳的感受力和洞察力。

然則《再生緣》中引起陳寅恪共鳴的究竟是哪些因素？余英時提出了三點：其一是「禪機蚤悟，俗累終牽」；其二是「絕世才華偏薄命」；其三則是「生不逢辰」。³⁷這三點中，筆者最為認同第一點，即陳寅恪認為自己與陳端生一樣屬於「禪機蚤悟」，但「俗累終牽」。《論再生緣》中有「嗚呼！端生於乾隆三十五年輟寫《再生緣》時，年僅二十歲耳。以端生之才思敏捷，當日亦自謂可以完成此書，絕無疑義。豈知竟為人事俗累所牽，遂不得不中輟。……至若『禪機蚤悟』，俗累終牽，以致暮齒無成，如寅恪今日者，更何足道哉！」等語，余英時所論已詳，³⁸茲不贅述。至於「才高命薄」和「生不逢辰」這兩點，筆者認為書中固然也有這樣的情緒流露，然所論稍失於寬泛。蓋古往今來，才高命薄、生不逢辰者比比皆是，陳寅恪獨有感於陳端生者何在，仍需作進一步探討。筆者認為，陳寅恪雖然盛讚《再生緣》第十七卷卷首自述「文詞優美，情感細膩」，倘若仔細考究，則這段文字最為打動陳寅恪之處當為個中流露的年華易逝的蹉跎感，尤其是今昔對比所造成的強烈反差。事實上，「禪機蚤悟，俗累終牽」的感慨亦同樣由此而發。

陳寅恪撰寫《論再生緣》時，每每強調自己是「衰年病目」，「頹齡戲筆」，並在文中時時穿插因《再生緣》之文而聯想起的舊年往事。這種站在生命的接近終點之處，對一生所遇做一整體回望的姿態，正與《再生緣》十七卷卷首十分相似。

在這段深為陳寅恪激賞的自述文中，開篇第一句即帶有極為強烈的悲憤情緒：「搔首呼天欲問天，問天天道可能還。」緊接著，陳端生向讀者說明自己當前的處境是「盡嘗世上辛酸味」，所以才情不自禁地「追憶閨中幼稚年」。然而，在當年美好時光——不論是未嫁之時的「姊妹聯牀聽夜雨，椿萱分韻課詩篇」，還是新婚以後的「挑燈伴讀茶聲沸，刻竹催詩笑語聯」——的對照下，眼前這種「日坐愁城凝血淚，神飛萬里阻風煙」的狀態只有更令人難以忍耐。³⁹在這裏，作者似乎是想要通過對其過往人生履歷的梳理，追問命運如此無常的原因。然而苦苦追索卻不得其解，遂只能「搔首呼天欲問天」。陳寅恪認為《再生緣》全書文字皆十分優美，然這一段較之其餘尤為出色。因為第十七卷卷首自述作於陳端生中年以後，陳寅恪特別讚其為「庾信文章老更成」。⁴⁰

在《論再生緣》一書中，陳寅恪隨手拈來中國文學史上的諸多名篇名著與《再生緣》比較。諸作之中，以提出庾信（513–581）的〈哀江南賦〉和汪藻（1079–1154）的〈代

³⁷ 同上注，頁229–32。

³⁸ 同上注，頁229–30。

³⁹ 陳端生（著）、趙景深（主編）、劉崇義（編校）：《再生緣》（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年），頁924。

⁴⁰ 陳寅恪：《寒柳堂集》，頁55。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這兩篇古文，乍看之下最為令人費解。因為這兩文不論是內容、形式，還是寫作年代，都與長篇彈詞小說《再生緣》相去甚遠。陳寅恪何以在品評《再生緣》的時候忽然對這兩篇古文大發議論？事實上，恰是這一看似突兀的聯想，為我們窺探陳寅恪如何看待《再生緣》提供了最有效的線索。

陳寅恪認為，宋代汪藻的〈代皇太后告天下手書〉和南朝庾信的〈哀江南賦〉，是四六駢文的典範，原因在於「庾汪兩文之詞藻固甚優美，其不可及之處，實在家國興亡哀痛之情感，於一篇之中，能融化貫徹」。⁴¹ 只是，這一「家國興亡哀痛之感」與《再生緣》又有何關係？作者為何要在一部討論《再生緣》的專著中，特別點出「家國興亡哀痛之感」對作品審美價值的重要性呢？筆者以為，陳寅恪之所以會對著《再生緣》而想到汪、庾兩文，乃是因為這三者有一共通之處，即都體現了早年境遇安樂，晚歲突逢離亂這一人生經驗，而這一點同樣是陳寅恪自認與陳端生身世相合之所在。

庾信〈哀江南賦〉作於侯景之亂以後，追憶梁朝早年承平時光，哀嘆「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班超為定遠之侯，王歙為和親之使。馬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將帥。豈知山嶽闐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⁴² 汪藻〈代皇太后告天下手書〉則作於靖康之難以後，回顧過往北宋歷史，有「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之句。兩者所表達的由盛世而轉危的傷痛，與《再生緣》十七卷卷首自述中「亨衢順境殊安樂，利鎖名疆卻掛牽。一曲驚弦弦頓絕，半輪破鏡鏡難圓」所呈現的情緒十分相似，而這一生命體驗亦正為陳寅恪所擁有。

陳寅恪生當光緒後期，其時清廷政權腐敗，內憂外患，已具末世之氣象。然而，個人的實際體驗與歷史的客觀評判之間尚未能完全等同。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中追憶這段時期，稱其為「依稀廿載憶光宣，猶是開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娛旦暮，京華冠蓋萃英賢」。⁴³ 在這種「承平體驗」的基礎之上，其後一系列喪亂帶來的「家國興亡哀痛之情感」才顯得尤為強烈。也正是有這樣的一種生命體驗在先，才使陳寅恪閱讀《再生緣》時，「深有感於其作者之身世」；而其所感者，從根本上來說，就是由「亨衢順境殊安樂」而突遭變故時那種「一曲驚弦弦頓絕」的強烈創痛感。

當《論再生緣》中全部關於陳端生的考證、評述皆已完成之後，陳寅恪言不盡意，又「請述寅恪讀此書之別感如下」：

寅恪所感者，則為端生於《再生緣》第壹柒卷第陸伍回中，「豈是蚤為今日識」一語。二十餘年前，九一八事變起，寅恪時寓燕郊清華園，曾和陶然亭壁間清光緒時女子所題詠丁香花絕句云：故園遙山入夢清，江關客感到江亭。（沈

⁴¹ 同上注，頁65。

⁴² 庾信：〈哀江南賦并序〉，載許逸民：《庾信詩文選譯》（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頁57-58。

⁴³ 《陳寅恪詩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1。

乙厂先生《海日樓集·陶然亭詩》云：「江亭不關江，偏感江關客。」不須更寫丁香句，轉怕流鶯隔世聽。鍾阜徒聞蔣骨青，（蔣子文「骨青」事出干寶《搜神記》。今通行本「干」書「青」字多誤寫，不足據也。）也無人對泣新亭。南朝舊史皆平話，說與趙家莊裏聽。詩成數年後，果有蘆溝橋之變。流轉西南，致喪兩目，此數年間，亦頗作詩，以誌一時之感觸。⁴⁴

由此皆可見，陳寅恪對陳端生同情的基礎，即在於寫《論再生緣》時，他同樣是經歷了由承平而至離亂的過程之後，站在生命已近尾聲之處，回望過往的人生歷程，並因此生出造化弄人的感慨。

除此之外，前文也曾提及，《再生緣》第十六卷卷末自述中有幾句話尤其受到陳寅恪青睞，即「起頭時，芳草綠生才雨好，收尾時，杏花紅墜已春消。良可嘆，實堪嘲，流水光陰暮復朝」。陳寅恪特別指出，這一段本自湯顯祖《牡丹亭》中「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同時又與《紅樓夢》中林黛玉的感傷不期冥會。只不過林黛玉的傷春出於曹雪芹（約1715–約1763）的想像，陳端生的感嘆則源自於真實的體驗，所以比之《紅樓夢》中的相關段落，陳寅恪更愛彈詞中的這幾句。⁴⁵倘使將其與《牡丹亭》相比，則端生的這段自述不僅承襲了原文「流水光陰」這一意象的運用，更強調了「起頭時」和「收尾時」這一時間對比，而今昔對比，時移人易，始終是陳寅恪論述中再三縈迴的一個重要主題。

《論再生緣》就其內容而言，可以分為兩大部份，前一部份考證作者身世，後一部份為文學評論。只是，在考證部份中陳寅恪亦時常夾雜數言論及陳端生的文采才思，這一隨記式的批評體例頗近於傳統的詩話、筆記。而在後一部份相對集中的文學評論中，陳寅恪有意識地對《再生緣》作一體系嚴整的全面評價，特從思想、結構、文詞三方面論述其文學成就。然而，相比較那些散見於全文之中，充滿了作者個人感慨的片段式品評，這些集中發明、意識明確的議論有時反而顯得遜色。例如，在說明《再生緣》結構精妙之時，陳寅恪認為，中國通俗敘事作品，包括《水滸傳》、《石頭記》、《儒林外史》等，「其結構皆甚可議」，散體小說中唯《兒女英雄傳》「結構精密，頗有系統」，彈詞中則首推《再生緣》。⁴⁶這一觀點，就其文學眼光而言，即未見其特別高妙。是書真正精彩之處，仍在於作者基於人生經驗所點出的《再生緣》格外感動到他的細節之處。如前文所論，陳寅恪將《再生緣》與古文如〈哀江南賦〉等並舉，或者特別偏愛自述文中有關「流水光陰暮復朝」的描寫等，都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提示我們重新思考《再生緣》的文化內涵和美學特質。

⁴⁴ 陳寅恪：《寒柳堂集》，頁75。

⁴⁵ 同上注，頁53。

⁴⁶ 同上注，頁60–61。

然而，這並不是說陳寅恪在討論思想、結構、文詞三點時便不見其個人特色。在論文詞之時，陳寅恪引元稹評價杜詩之語來評價《再生緣》，已打破了一般讀者或文學研究者對彈詞完全隸屬於通俗文學的認識。在論及作品思想之時，陳寅恪的評議尤其可見其一貫秉持的文化觀念。

陳寅恪曾就《再生緣》中女主人公孟麗君受其未婚夫皇甫少華、其翁皇甫敬跪拜等情節，論陳端生之思想如下：

則知端生心中於吾國當日奉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綱，皆欲藉此等描寫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在當日及其後百餘年間，俱足驚世駭俗，自為一般人所非議。故續《再生緣》之梁德繩於第貳拾卷第捌拾回中，假皇甫敬之口斥孟麗君，謂其「習成驕傲凌天子，目無姑舅亂胡行」，作《筆生花》之邱心如於其書第壹卷第壹回中，論孟麗君之失，謂其「竟將那，劬勞天性一時捐。閱當金殿辭朝際，辱父欺君太覺偏」，可為例證也。⁴⁷

這一論述乍看與鄭振鐸所謂「為女性發聲」或郭沫若所謂「反封建」⁴⁸相近，但事實上其出發點則不盡相同。

陳寅恪特別指出，陳端生最值得欣賞之處乃在於她「於吾國當日奉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綱」，皆欲摧破之，並標榜其為「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⁴⁹此說令人聯想到向被認為承載了陳寅恪學術精神核心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之提出，首見於陳寅恪1927年所撰〈王觀堂先生輓詞序〉中。在這篇著名的序言中，陳寅恪將王國維(1877–1927)自盡的原因歸結為中國文化衰落所帶來的痛苦。陳氏認為：「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晚清以降，中國社會固有的經濟制度變遷，導致傳統社會制度無所依附，造成以三綱六紀為表徵的中國傳統文化徹底衰亡。王國維作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遂與之同命而共盡。⁵⁰在此處，令人困惑的是，陳寅恪以摧破君父三綱的陳端生和殉三綱六紀之傳統文化的王國維同為「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代表人物。王元化(1920–2008)首先注意到兩者之間的矛盾：「他〔陳寅恪〕一面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中感歎三綱六紀之淪喪，一面又贊賞被斥為『不安女子本分』的陳端生，說她心目中『於吾國當日奉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綱，皆欲借此描寫以摧破之也』。」⁵¹對這一問題，王元化並

⁴⁷ 同上注，頁59–60。

⁴⁸ 《郭沫若古典文學論文集》，頁872。

⁴⁹ 陳寅恪：《寒柳堂集》，頁60。

⁵⁰ 《陳寅恪詩集》，頁5。

⁵¹ 王元化：〈論道德繼承〉，載東方編譯所（編輯）：《中日東方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頁23。

沒有深入解釋，只是將其歸為陳寅恪那一代知識分子共有的在東西文化的強烈碰撞和衝擊中產生的矛盾。

筆者認為，陳寅恪個人對三綱六紀持反對抑或留戀的態度不是解釋這一矛盾的關鍵所在。王國維和陳端生雖然在對待三綱六紀的態度上正相背離，但兩者有一共通之處，即其理想都與當時一般的世俗價值觀念相悖。不論是身處「男尊女卑，夫為妻綱」的環境中而幻想憑一己之才顛倒乾坤的陳端生，還是生當晚清學國變革之際卻戀戀於固有文化不能「與時俱進」的王國維，都悖逆其所處時代的意志，堅持無法溶解於意識形態背景之下的個體選擇，並將這一選擇訴諸實際的行為或文學表現。陳寅恪所欣賞的，正是這種忠於本心的個性化思考和抵抗習俗的獨立判斷力。

所以說，陳寅恪之深感於陳端生的，不是她的反三綱六紀，反傳統文化，而是她拒絕成為一個時代期望她成為的女子。陳寅恪在推舉《再生緣》之時已經指出：「噫！中國當日智識界之女性，大別之，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專職中饋酒食之家主婆。第二類為往來酬酢之交際花。至於第三類，則為端生心中之孟麗君，即其本身之寫照，亦即杜少陵所謂『世人皆欲殺』者。前此二類滔滔皆是，而第三類恐止端生一人或極少數人而已。」⁵²由此可見，在一眾「滔滔皆是」的女性中獨能免俗，是陳寅恪欣賞陳端生的重要基礎。與之相對應的則是，郭沫若同樣盛讚陳端生思想拔俗，唯其原因則是她生於「封建時代」而已超前地具有「反封建」的思想。郭沫若還附帶指出，《再生緣》中仍有頗多宣揚忠孝節義之處，陳端生「以封建而反封建」，未為徹底，只是「在舊時代總應算得是出人一頭地的了」。⁵³這一論斷基本為此後的文學史敘述所秉承。⁵⁴然而，對陳寅恪而言，自由思考的態度、獨立判斷的勇氣、卓爾不群以至陷入「世人皆欲殺」的處境，才是他同情端生的根本原因，至於其所反叛的對象反而並非如此重要。

綜上所述，陳寅恪因深有感於《再生緣》作者的身世才開始對這部作品的全面研究，並最終寫下四萬餘字的《論再生緣》。究其何以能被一位三百年前的女性彈詞作家深深打動，筆者認為原因在於陳寅恪對陳端生身世的同情和對其思想的欣賞。就其身世而言，因為陳寅恪本人有從承平至離亂的創傷經驗，所以能對相關描寫別有感觸。就其思想而言，陳寅恪所以稱端生「為當日無數女性中思想最超越者」，乃因其不依附於當時主流的價值觀念而堅持自己的獨立取捨。在陳寅恪看來，《再生緣》所以堪稱經典，首先在於它是陳端生生命歷程及人格精神的反應，而後方及於其想像力、敘事技巧、用詞遣句等諸多長處。

⁵² 陳寅恪：《寒柳堂集》，頁60。

⁵³ 《郭沫若古典文學論文集》，頁872-73。

⁵⁴ 駱玉明、章恆培即認為陳端生「鮮明地表現出掙脫封建倫理對於女性的束縛的要求」。見駱玉明、章恆培：《中國文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569。

餘論：中國文學批評史視野中的《論再生緣》

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郭紹虞（1893–1984）所撰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是為現代學術意義上第一部重要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專著。⁵⁵同年十月，朱自清（1898–1948）在《清華學報》上發表〈評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一文，開篇即對中國文學批評領域的著作做一簡要梳理。朱自清指出，系統的自覺的文學批評著作，中國只有鍾嶸的《詩品》和劉勰的《文心雕龍》兩部。而即使是這兩部著作，主要還是在論述文體的源流利弊以及屬文的方法，批評只是其附屬內容。整體而言，中國歷史上的文學批評著作都有如下的傾向性：「這一類書裏也不盡是文學批評的材料；有些是文學史史料，有些是文學方法論。反過來說，別類書裏倒蘊藏著不少的文學批評的材料，如詩文集、筆記、史書等。」⁵⁶可以說，嚴格區分文學批評與文學史、文學方法論之間的學科分類一般被視為現代學術研究所擁有的視野，而各方面的論述交織呈現則是中國傳統文論的慣常做法。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陳寅恪的《論再生緣》就其體式而言，頗似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

是書之中，作者一方面顯露了從純粹的文學批評角度界定《再生緣》成就的意願，最明顯的例子即是文中集中討論《再生緣》思想、結構、言辭的段落。另一方面，作者對其文學性的感受和體悟散見於史料的鉤沉和文獻的考索之中。傳統文人較少會將思想、結構、言辭三方面嚴格區分，分門別類地、系統性地考察一部作品的綜合價值，而現代學者則一般不輕易在論述中夾雜過多對個人往事的回憶及主觀情緒的抒發。然而，正是這一「不古不今」⁵⁷的風格使得《論再生緣》不僅對彈詞研究具有特殊的啟發，即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亦成為一個有趣的特例。

前文已經提及，陳寅恪集中探討《再生緣》思想、結構、文辭的段落雖亦極有洞見，例如論陳端生「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或就其措辭之「屬對律切」、「排比聲韻」比照杜詩等等，但相對而言，《論再生緣》中最為精彩的不是這些基於文學史、文

⁵⁵ 在郭紹虞之前，上海中華書局在1927年出版了陳鐘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是為中國文學批評史領域的首部著述。然陳著所引材料主要都來自歷代詩話和正史文苑志，然後隨文釋意，略加說明卻未予整理、闡發，全書內容單薄，而方法上更近傳統文人而非現代學者，是以郭紹虞所著《中國文學批評史》仍被目為該領域內第一部實際具有影響力的專著。

⁵⁶ 朱自清：〈評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載《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539。

⁵⁷ 陳寅恪自稱「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載張步洲、劉桂生（編）：《陳寅恪學術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頁18。汪榮祖認為「不古不今之學」是就其所研究的內容而言，「所謂『不古不今』指國史中古一段，也就是他研究的專業」。見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頁80。此處借用來談陳寅恪的研究方法。

化史判斷得出的結論，而是基於作者個人經歷、人生體驗而抒發的感想，例如在提到《再生緣》中「豈是早為今日讖」一句時，陳寅恪特別回憶了九一八事變之後自己在陶然亭壁上讀到的光緒時女子所題的兩首詠丁香絕句，以及自己先後寫於流轉西南之際、就醫英倫之後等等時期的諸首絕句，感慨之情溢於言表。引錄這些詩作，皆非直接用以為《再生緣》中「豈是早為今日讖」作注，只是以其同樣具有「一語成讖」的暗示意義而深為陳寅恪所慨嘆。這一發散式的聯想在傳統詩話、詞話中頗為常見，但現代學者則較少會在專業論文中作此游離於主題之外的敘述。然而，筆者認為這一看似枝蔓的散談對鑑賞《再生緣》原著有特別意義。經由陳寅恪闡發之後，不但《再生緣》作者陳端生與其所撰文本之間構成饒富魅力的參照關係，陳寅恪本人與陳端生之間亦形成一種參差的對照。以「豈是早為今日讖」為例，對熟悉《論再生緣》中相關論述的讀者而言，這一句不僅僅能引發對陳端生身世的同情，其背後那種個人面對命運時無能為力的傷痛感實有一種更具普世性，亦同時更為深遠的意涵。

特別提出這一點，並非筆者認為傳統的文論於方法上更優於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文學批評，或有價值的文學評論必須像陳寅恪那樣結合中西古今並帶入個人感受。事實上，陳寅恪能採取這一特殊視野觀照《再生緣》，乃是因為各種主、客觀條件的作用。換言之，這一做法難以複製，更不可能推廣為文學批評學科中的典型方法。

首先，陳寅恪是一位專營中古史的學者，文學研究非其本職，也許基於這一原因，作者得以更為隨意的發揮。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陳寅恪撰寫《論再生緣》時已經年過六旬，雙目失明，且充滿了各種戰亂、流離的創傷記憶，情鬱於中，或難自抑。再者作者撰寫此文的動機僅出於個人興趣，無意正式介入學界討論，這從書成之後陳寅恪僅以自費油印方式刊行可見一斑。⁵⁸是以，《論再生緣》雖從本質上來說是一部學術專著，但對於陳寅恪而言卻同時承擔了抒發個人情緒、懷舊、紀念、反思等諸多功能，作為學者的理性判斷和作為個人的感性體驗交相作用，致使是書同時兼具嚴謹的專業式論證及自由的個性化漫談。然而，這種感性體驗對於文學批評者而言可遇而不可求，同時日趨專業化的現代學界對學者的自由發揮也形成越來越大的限制。以上種種，皆使這一陳寅恪式的批評方式只能為學術史上的特殊個案。但這一個案卻為後代學者提供極有價值的啟示意義，不論是針對彈詞研究，還是就更為寬泛的中國文學批評而言。

朱自清曾經感嘆：「現在學術界的趨勢，往往以西方觀念為範圍去選擇中國的問題；姑無論將來是好是壞，這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事實。」⁵⁹這一無可避免的趨勢對中

⁵⁸ 汪榮祖稱：「油印令人有一種不准正式出版的印象，但蔣天樞說，油印原是乃師的本意，以後再收入文集，並無寄投期刊不發稿，或要出書不准之事。」見王榮祖：《史家陳寅恪傳》，頁177。

⁵⁹ 朱自清：〈評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頁541。

國文學批評的發展顯然有利有弊。一方面，西方理論的輸入使得原本未成體系，僅僅依附於文學史史料、文學方法論的中國文學批評迅速確立格局，發展為獨立學科。另一方面，由於中西文學本身的思想脈絡、美學風格差異巨大，西方文學的理論及研究方法或未能全然貼切地觀照中國的文學作品。同時，現代學者以不夠嚴謹之故，放棄條例式的詩話、眉批式的小說評點等傳統批評方式，一定程度上也犧牲了介入文本更大的靈活性和自由度。是以，朱自清雖然清醒地認識到以西方概念為範圍考察中國問題是一個不可變更的趨勢，卻仍然對郭紹虞書中運用西方理論闡釋中國文學的地方頗有微詞。如何在西方的強勢影響下保持中國固有的學術研究特質，這似乎是長期困擾現代學者的命題，而對陳寅恪批評方法的重新思考或許能有助於尋找答案。

Methodology, Perspective, and Cultural Context: *Lun Zaishengyua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Abstract)

Zhang Sijing

Previous studies of Chen Yinke's *Lun Zaishengyuan* focus mainly on how to reconstruct Chen Yinke's own secluded frame of mind when he was composing the work in his late years. However,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thinks that, as a major piece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study of *tanci*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Lun Zaishengyuan* deserves a close examination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the literary approach that Chen took in his investigation. Chen Yinke was the first scholar ever to make an intensive probing into the lyrical rather than narrative skills in *tanci* compositions. And, by doing so, he placed the genre in the grand tradition of classical and élite literature. Chen Yinke's perspective on *Zaishengyuan* goes beyond that of a feminist approach; it calls for a rethinking of the aesthetic quality of the *tanci* as well as a re-evaluation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direction it has taken since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關鍵詞：彈詞 《論再生緣》 陳寅恪 文學批評

Keywords: *tanci*, *Lun Zaishengyuan*, Chen Yinke, literary criticism